

浅论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的拓荒

作者：卢万玉 文章来源：中华文史网 点击数： 更新时间：2007-12-14

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。“四十年来，中国之大事，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。”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评价，在他盖棺后的近80年来“论犹未定”。误国、卖国之罪不可否定，但也还有爱国进取之心。本文仅就他在洋务运动时期，对中国近代化的开拓功绩，作点赘论。

1

李鸿章字渐甫，号少荃，1823年（道光三年）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。1847年在科举的道路上爬上了进士的名位，开始跻身于封建统治者的行列。从他步入仕途官阶之始，就正是西方列强肆志于东方，“西力东渐”的时代。英国侵略者用鸦片加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。1851年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，以疾风扫落叶之势，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，横扫了清王朝统治下的半壁河山，建立了与清朝对峙的农民政权。农民战争的威胁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，震惊了地主阶级中的部分当权派，促使他们开始思索、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，为支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而谋求安内制外之策。

李鸿章在勾结外国侵略者抵抗太平军进攻上海的作战中，“其亲睹器械之利”，“深感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。”（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朋僚函稿卷二、三。）决心“取而用之”，向外国购买洋枪洋炮，“仿募覃思之士，知巧之匠，始而演习，继而制造”，“以资攻剿”（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奏稿卷九。）在“华洋会剿”太平军期间，他开始看到来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威胁较农民起义更甚，他说：“盖目前之患在内寇，长久之患在西人，若不及早自强……厝火积薪，可危实甚”，并认为“我自能强，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覬覦，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。”（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朋僚函稿卷二、三。）他积极向总理衙门陈述：“天下事穷则变，变则通”的哲理，力主向西方学习，“师其所能夺其所恃”（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奏稿卷十九。），达到“与英法相为雄长”，抵御外国侵略的目的。作为洋务派代表，李鸿章和封建顽固派一样，是要加固封建统治的堤防，但采用什么材料和方式来强化？李鸿章比顽固派显得较有远见。他能将目光投向世界，明察时局。首先惊呼中国处“三千余年一大变局”，而“昧于三千年一大变局”，“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钜而痛深”（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奏稿卷十九。）的历史教训。在面对“变局”、“强敌”的形势下，提出必须走出国门，学习先进，建“数千年未有之奇业”（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奏稿卷三十九。）。他分析“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，故能横行于中土，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土炮，故不敌于彼等，是以受制于西人”的重要原因。这里虽说是一种唯武器论，也认识不到武器的落后正是反映了清王朝封建制度的腐败。但李鸿章承认了落后的现实，正视中西方之间的差距，清醒的认识到了要抵抗住外来的侵略，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改变落后状况。针对顽固派无事则“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，以为不必学；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，以为不能学”的冥顽思想，他大声疾呼“欲保和局守疆土，亦非无具而能保也”（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奏稿卷十九。）。必须以自强为基础，以“富国强兵”的实力作后盾。李鸿章的见解，不仅是十九世纪后期，中国封建统治者改变统治方式、巩固其反动统治的需要，也是“救时”、“救国”之要策。

李鸿章是置身在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，面对政府政治腐败，军事、经济十分落后的现实，提出要“稍变祖宗之成法”，寄希望从“变”中寻找出路。他的所谓“变”，就是把魏源早已提出过的，师夷长技在于“一战舰、二火器、三养兵练兵之法”（魏源：《海国图志》筹海篇三。）的向西方学习的内容，逐步加以付诸实践和扩展开来。李鸿章说过：“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，独火器万不能及”的话，反映了他的“以纲常名教为本，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”的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，浸透着李鸿章地主阶级的封建属性和对封建统治的耿耿忠心。李所说的“火器万不能及”，也说明了他承认了中学的不足，承认了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力已经不能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，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就是证明。因此必须“及时改辙，知所取法，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，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。”（《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》卷五。）所谓“变计”就是“采西法”固“中体”，对清王朝之“体”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。这里既包含有维护清王朝封建制度的因循守旧落后观点，也反映出要引进先进的生产力、发展民族经济，求“自强”、“自立”抵御外侵的爱国思想。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，封建制度已成为阻挡历史前进的桎梏，冲击这一桎梏，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近代中国不可阻挡的潮流。作为地主阶级一员并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李鸿章，是不可能清楚认识到的，但他在“变局”和“强敌”压境的危亡局势下，把学习西方的富国强兵之策，努力付诸实践，比起昏顽、愚昧、空喊“礼仪”治国、救国的封建顽固派，的确可称“鹤立鸡群”。他的思想、言行并没有越出封建囹圄，但却给这种封闭的囹圄打开了一道缺口，代表并领着统治阶级中“不想灭亡”的那部分人，走出国门，顺应历史潮流不自觉地迈开了前进的脚步。

2

李鸿章办洋务从60年代开始，至甲午战争结束。正如梁启超所说：“为李鸿章传，则不得不以洋务二字总括其中世二十余年之事业”。这话不假，（梁启超：《饮冰室文集·专集》三，《李鸿章》。）从1862年李奉命率淮军东援上海抵抗太平军的进攻，清政府授他江苏巡抚职，开始取得地方军政实权始，就“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习西人一二秘法，期为增益”。在上海设西洋炮局三所：一所由英人马格里主持，后移至苏州。1865年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后，又将炮局移至南京，加以扩充后改为金陵制造局。这所炮局“募英法弁兵通习军器者，仿照制办”；一所由副将韩殿甲主持；一所由苏松道丁日昌主持，未雇洋匠，由中国工匠仿照外洋方法制造。

1865年在上海虹口购买美国人的旗昌铁厂，与丁日昌、韩殿甲主持的两所炮局合并，以此为基础成立江南制造总局。曾国藩于1863年派容闳从美国购回的母机机床也并入总局。曾、李又联合奏准拨留江海关税二成充作经费，扩建新厂，至1868年，江南制造总局已扩建的各类分厂达十三个和一个工程处，是清政府最大的官办军事工业。该厂的第一任务是“以制枪，借充军用为主”；第二任务是制造轮船。1868年造出中国自制的第一艘轮船——“恬吉”号（后更名惠吉）下水，至1885年，先后造大小轮船十余艘。1890年设炼钢厂，在此后的40年间，共炼钢8000余吨，平均每年产量不足600吨，数量虽低，它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炼钢厂。1870年，李鸿章升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接办了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创办的天津机器局，加以扩充，除制造各种军火外还设有水师学堂。李鸿章用他创办的军事工厂自制出来的枪炮，对镇压农民起义起了“甚为得力”的作用，为维持清王朝的统治立了“大功”。但从另一面所透视出来的引进先进技术、练兵制器取得的成果来看，也为抵御外侮增强了清政府的国防力量，开启了中国国防的近代化，促进了交通运输等民用工业的发展。中国工业近代化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“中国重工业的发展，不能忘记李鸿章”的作用。

70年代始，李鸿章开始注意西方的政治制度，提出改变传统的思想方法和生产方式、注重商务。他在奏折中说：“古今国势，必先富而后能强，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。”（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奏稿卷二十。）强调“自护利源，劝令华商出洋贸易，庶土货可畅，洋商可少至，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”，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商战。主张“购器设局，自行制造”，达到“敌洋产”、“收利权”，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、交通、资金饷源的匮乏。为此，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航运局、第一家电报局、第一个矿务局、第一家机器织布局，第一条铁路。由他始终控制的这四大民用工业，在与外国侵略势力进行商战中，都发挥过一定的作用。

轮船招商局，成立于1872年。李鸿章在致总署函中说明了该局的目的“一在吸收本国游资，一在收回长江江海航运之利权，一在挽救中国军事上内外联络之缺陷。”（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译署函稿卷一。）因而轮船招商局创办始终，都得到李鸿章的特殊照顾。在“商为承办，官为维持”的原则下，从政治、经济上进行保护和支持，使轮招在“商困民穷，势已岌岌”（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朋僚函稿卷二、三。）的危局中得到生存和发展。1877年，以20万两银收购了旗昌产业，发展成一支拥有33艘轮的商船队，形成了“各通商口岸船步屯棧林立，駁驾怡和太古之上”（转引自李守孔：《李鸿章传》。）的欣欣局面。在此后的十七年中，所得利润“总共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三千万两”（上海图书馆藏李鸿章未刊稿。）。正因为如此，他遭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责难，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是要“把外国人从中国的沿海及内河贸易排斥出去”。这虽是言过其实，排挤出去的目的并未达到，可总算收回了部分利权，挤走了旗昌，打击了外国轮运对中国江海运输的垄断，还解决了清政府漕运和部分财政困难。

李鸿章最早于1875年奏准试开湖北广济县阳城山煤矿和江西兴国铁矿。用土法开采，效果不佳。1877年又奏准开采张家口外科尔沁铅矿，同年派丁寿昌唐廷枢等筹设滦州开平矿务局，1881年正式成立，是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用机器采煤的矿局。从此中国兵轮、商船及机器制造各局所需用煤不致远涉重洋购进，打破外资的控制”，亦可免利润之外泄”（《洋务运动》丛刊（六）。），收到了“以裕军需，而收利权”（《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》卷五十五。）的部分效果。此外，李鸿章于1886年奉旨筹设漠河金矿，1888年正式开工，一年后出金19000余两，至光绪十九年间所出沙金达63000余两（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奏稿卷七。）。另外还主持开办山东峄县煤矿，热河四道沟铜矿等。这不仅为清朝财政筹开了利源，也起了抵制沙俄及其他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觊觎我矿产的作用。

1879年李鸿章筹设织布局于上海。那是在上海开埠以后，“洋沙、洋布入口，华人贪其价廉物美，相率购用”，“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城市镇，衣大布者十之二三，衣洋布者，十之八九”（郑观应：《盛世危言》卷四。）的情况下，李鸿章认为，对外商输入洋纱、洋布，“今既不能禁其不来，惟有购备机器，纺纱织布，自扩其工商之利，以保利权”。他向清政府奏请在上海试办织布局说：“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，设局仿造布匹，冀稍分洋商之利”（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奏稿卷四。）。表明李创办织布局的目的，一方面是看到外资在华设厂办工业日增，生产效率高，获利丰厚，而引起仿效自办的兴趣，是因为有利可图；但另一方面所表现的“敌洋产而杜漏卮”（汪敬虞：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》。）、“稍分洋利”的动机和目标也不能忽视。从李所控制的民用企业就“炼铁、织布两大端来看，每岁中国之银，少漏入外洋者不下四、五千万两”（《洋务运动》丛刊（七）。）。难怪遭到外国侵略势力的忌恨，说他“正在尽力进行垄断”，“开始严重干扰对外贸易”。这正说明织布局的创办，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，客观上起了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作用。

改革教育，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，是李鸿章洋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首先是培养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，他说：“中国与洋人交接，必先通其志，达其欲，周知其虚实诚伪，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。”有了自己的翻译人才，在和外国人交接时，就可避免外国翻译的“偏袒捏架情弊”（《刘状肃公奏议》，卷六。）。并认准“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在西人之下。果有精熟西文，互相传习，一切轮船火器等技巧，当可由渐通晓，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。1863年，他奏请仿照京师同文馆成例，在上海、广东等地区增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。此后“天津、上海、福建、广东仿照枪炮船械之地，无不兼设学堂，风气日开，人才蔚起。”（《刘状肃公奏议》，卷六。）他强调在向西方学习时，重要的是要“觅制器之人”，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，给以优厚待遇，甚至还提出“专设一科取士，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，则业可成艺可精，而才亦可集。”（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奏稿卷三。）以功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奖励士子们入“洋务”科馆学习，这的确是李鸿章的创举、是他的“洋务”思想对科举八股取士的渗透和冲击。

1870年他接受留美学生容闳的建议，和曾国藩联衔专折奏准选派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肆习技艺，这不仅是开中国近代官费留学之始，也是对夜郎自大的封建清王朝的冲击。1876年李鸿章针对船政学堂及船厂仿照西方制造技艺“皆其初时旧式”的缺陷，认为“若不前赴西洋观摩考察，终难探制作之源”（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奏稿卷二。），奏请利用德国教习李勳勋回国之便，派令“游击卞长胜等七人随同赴德学习陆军”。同年又与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联衔奏准派福建船政学堂学生14名、艺徒4名，赴德国学制造驾驶，12名学生赴英国水师学堂习水师作战各法。从1872年至1886年间，李鸿章等洋务派先后向欧美派遣了共计200多名留学生。按他所设想的派员留学意图，是使“艺徒学员赴英、德观摩考察，探制作之源，窥操练、驾驶之秘钥”，“以期数年之久，必可操练成才，储备海防之用。”（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奏稿卷二十八。）在当时还处于封闭式的、封建传统教育占绝对统治的自我陶醉的时代，李鸿章高瞻远瞩，提出派遣学生出国学习，要求联系实际，实地考察、探求“秘钥”、“精通”各国制造、驾驶、水师兵法，操练成才，为国防“储备人才”的教育思想是难能可贵的，无疑是对愚昧、锁国的封建教育的冲击和改革。随着军事和海防工业的需要，从70至80年代，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电报学堂、水师学堂、武备学堂、军医学堂等一批新型近代军事学堂，培养了一批掌握近代军事理论、科学技术、工程、外语等专门专业人才。这些捷足先登的行动，和对西方先进教育的引进，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功劳和初愿，但也不可否定李鸿章在其中所起的主要作用。

3

李鸿章办洋务企业， “上受制于腐败之清廷，中受制于保守之同僚，下受制于愚昧之国人”（转引自李守孔：《李鸿章传》。）。每倡导一洋务事业，都遭到顽固派的阻挠、攻击、“不能尽行其志”（梁启超：《饮冰室文集·专集》三，《李鸿章》。）。如修筑铁路问题，早在1863年冬，李鸿章率军攻克太平军占领地苏州时，就有英美侨商联名请求李修筑上海至苏州间的铁路，但因畏惧顽固派攻诋而未敢接受。1874年李鸿章向总理衙门大臣、恭亲王奕訢正式提出建清江浦至北京铁路，恭王表示赞同，但不敢上陈，谓“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”，从此绝口不谈。1881年，李鸿章支持刘铭传的“暂借洋债”修筑南北四干道的主张，一时舆论嚣然，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骥、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反对尤烈。王在奏议中痛反李鸿章是“变法改制”、骂他是“跋扈不臣，俨然帝制”、“是假外援以窥神器”（《李鸿章年谱》，1881年，3、4条。）。把篡权夺帝位的重鼎压在李鸿章的头上，致使李不敢入奏，内地修铁路计划未能实现。李鸿章也只能凄凄悲鸣：“都中群议，无能谋及远大，但以内轻外患为患，日颯颯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，又仅挑剔细故，专采谬悠无根之浮言。”（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海军函稿卷三。）他认为天下事无不误于互相牵制，并表示“鸿章生平不能空言高论，只知以实心办实事”。为了开平煤矿运煤的需要，他奏准修筑自唐山煤井至胥各庄一条全长20里的运煤铁路，这是近代中国修成的第一条铁路，后延修65里至阎庄，1888年修至天津。同年又建议由海军衙门奏准修筑津通铁路，从此开创了近代中国自修铁路计划之始。

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海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。他以在清廷的特殊权位，使其所控制的北洋海军得到了良好的近代化装备和扩展。在“为北洋捍门户，为京师固根本”的思想指导下，依靠向德、英等国购进铁甲、巡洋舰及大小船支；又从闽沪厂调进自造轮船，编组成拥有各种舰艇25艘

的北洋舰队，并先后在大沽、旅顺口、威海卫等建筑船坞，“其规模阔，实为各国均澳之冠”（薛福成：《出使英、法、意、比四国日记》卷四）。在旅顺口、大连湾、威海卫修筑的各炮台“相为犄角，锁钥谨严”，获得了“东海屏藩”之誉。所以李鸿章在巡阅海军事竣折中，心满意足的吹嘘就渤海门户而论，已有深固不摇之势”80年代后期，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激烈，主持海军衙门的奕譞为满足慈禧太后享乐的需要，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。户部尚书翁同龢“不能正言抗旨，撙节国用，以备不虞”，李鸿章也“未敢淡请”，还公然表示支持奕譞的作法，因而严重影响了海军的建设与扩展。清王朝统治者昧于形势，歌舞升平，尽情享乐，腐败已极，日本却极力遵循“强兵为富国之本”，“耀皇威于海外”的军国主义方针，积极扩军备战。作为统治者中较识时务的李鸿章是察觉到了的。当1891年翁同龢奏请南北洋购置外洋枪炮、船只、机器暂停两年时，李鸿章复奏就气愤的表示：“方蒙激励之恩，忽有汰除之令，惧非重海防，兴士气”（《洋务运动》丛刊（三））。他看出日本“狡焉思逞”的侵略野心，在奏折中忧心忡忡地说：“日本蕞尔小邦，犹能节省经费，岁添巨舰。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，迄今未添一船，……窃虑后难为继。”（《洋务运动》丛刊（三））形势的发展正如李鸿章所预料，因清朝统治者的腐败，中国海军建设止步不前，日本海军则由弱变强，发动侵华战争。由于李鸿章贪恋权位，忠诚地执行慈禧太后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，避战保船，乞求帝国主义出面干涉之误，加之北洋海军自身的腐败因素，各省大吏又“徒知划疆自守”（转引自李守孔：《李鸿章》传。）的地域、派系之见等种种原因，致使北洋海军及所有海防设施也随甲午战争的失败而覆灭。李鸿章误国、卖国之罪是不可饶恕的，但不等于所创办的近代海军、工程功绩也随李鸿章的卖国之名而被唾弃。“作史者必须以公平之心行”（梁启超：《饮冰室文集·专集》三，《李鸿章》）。李鸿章是生在不以个人意志为选择的时代与社会，他虽以封疆大吏辅佐清政权，又久居要津、柄持大权，但鉴于封建政体，慈禧太后专权，全国军旅皆腐败，各省大吏“徒知划疆自守”，立于他人背后“揄其短长以为快谈”（梁启超：《饮冰室文集·专集》三，《李鸿章》）。），军政出于多门，洋务事业受多方掣肘，他也有“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”（转引自李守孔：《李鸿章》传。）的苦衷。所办洋务事业，“不过勉强涂饰，虚有其表”（转引自李守孔：《李鸿章》传。）终被日寇的炮舰撞垮了。但应该承认的事实是，这些军事设施、海防工程、北洋海军在反击外来侵略者的“炮战”、“海战”、“陆战”中都发挥了近代化人才和武器的威力。

闭关自守的中国封建大门，被资本主义的鸦片、炮舰撞开，他们对中国施行划分实力范围的殖民掠夺政策。为此，他们既要在自己的侵略势力范围内，输出一些在本国来说是落后了的，而对于被侵略的落后国家却又是先进的技术，以适应其掠夺的需要；又要在科技、资金、人才、资源、管理上控制中国近代化事业，阻碍它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。李鸿章为主观因素及客观条件所限制，是不可能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的。但他在当时极复杂的环境形势下，冲破重重阻力，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，对资本主义侵略者还能保持一定的警惕。在人才、技术上力求摆脱外国人的控制。还在1865年他就说过：“机器制造一事，为今日御侮之资，自强之本”，学习西方要师其法而不必用其人”。创办江南制造局意在“取外人长技，以成中国之长技，不致见拙于相形，斯可有备而无患”。轮船招商局的高股股票，要求填写姓名、籍贯”以杜洋人借名”，股票“不准让与洋人”，以防洋人对招商局的控制。设上海织布局，要求“以华棉织布，酌耗成本，抵敌洋产”（《洋务运动》丛刊（七））。这些措施反映了既要学习西方的长技，又体现维护企业独立自主的竞争意识。在修铁路问题上，他一方面支持刘铭传的引进外资修筑铁路的建议；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防范洋人控制铁路主权的措施，诸如规定“一切招工购料经理铁路事宜，由我自主，借债人不得过问”；“不准洋人附股”、“不得将铁路抵交洋人”；所借洋款“由国家指定日后所收铁路之利陆续分还”（《洋务运动》丛刊（六））。北洋海军的建设，主要依靠向英、德、法等国购买船舰、技术，聘请外国人训练军队。任教习的外国人还可“畀以提督衔”，但这种头衔”在吾国不过虚号崇优，非实职也”，“其职守在于各顾问”。还规定了在舰队任职的外国人，都是受雇于中国的雇员，“一切调度事宜，事权悉由中国主持。”（《洋务运动》丛刊（一））。在当时中国处于救亡图存的时代，既依靠外国技术、人才建设近代海军、海防、铁路；又注意防范洋人渗透、控制。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，加之李鸿章自身的买办、封建意识，及能力所限、派系私利所为，这些规定多是“纸上谈兵”，不可能都兑现，但在字里行间，却仍可见到闪烁着追求自强、自立、维护主权和民族利益的爱国思想。

李鸿章在清王朝从“少年科弟、中年戎马、晚年洋务，一路扶摇，遭遇不为不幸。”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，勋爵、疆吏的显荣权位，决定了他的反动本质，与封建统治相依为命的关系，障碍了他“结民心以战胜旧党”、“雷厉风行地改革庶政”朝资本主义转向。他举办洋务活动，是为了挽救风雨飘摇中的清朝封建政权；他勾结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，用引进的技术、军事工厂自造的、帝国主义提供的近代化枪炮、共同残酷地镇压了农民起义；又利用引进的先进技术、外资、人才举办国防、海防工业、交通运输等民用企业，试图抵御资本主义军事、经济侵略。在不同程度上起了与外国资本主义争利、抗衡的作用，维护了清王朝的苟延残喘，这是李鸿章的本意。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，一个人的“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，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”。李鸿章所进行的洋务事业，实际上也产生了与李本来意愿完全相悖的结果。他没有想到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、近代教育会冲击封建传统的思想、文化、观念，破坏封建制度的根基；他没有料到倡办的练兵、制器、造船、开矿、铁路、邮电、办学等不仅增强了国防近代化以抵抗外侵的力量，增强了独立自主的竞争意识，而且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引进、中国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，商品经济的发展，资本主义经济从封建政权里直接脱胎出来，产生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—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。加速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垮台和资本主义发展。这种符合人民的愿望、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，不是李鸿章的预期目的，但这些进步因素的萌发，又无不与李鸿章“超卓之眼孔”、思想、行动紧密相联系。既然洋务运动的潮流冲开了中国近代化的“闸门”，那么作为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首领人物之一的李鸿章，也自应是这一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，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人物。

（资料来源：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》哲社版1991年第1期。）</> td>

文章录入：zhangzy 责任编辑：djd

- 上一篇文章：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
- 下一篇文章： 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化的发展

【发表评论】 【加入收藏】 【告诉好友】 【打印此文】 【关闭窗口】

最新热点

最新推荐

相关文章

没有相关文章

